



从「西化」到现代化

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WESTERNIZATION

「西化」现代化」丛书

上册

第一编 东西文化观：东方化还是西方化？

第二编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罗荣渠 主编

黄山书社

「西化」现代化」丛书

从「西化」到现代化

上册

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文选

第一编 东西文化观：东方化还是西方化？

第二编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罗荣渠 主编
任 菁 王美秀 执行编辑

黄山书社

WESTERNIZATION

编者前言

一、为研究“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想的发展脉络，本书选编了1919—1949年间我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问题，几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资料，供研究者参考。过去除东西文化观问题之外，其他几次论战很少有人研究过，因此本书大多数文章是第一次按专题汇编出版。胡适用英文写的文章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发表。

二、有关这几次大论战的文章甚多，本书选收的标准主要是看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和不同观点的代表性。由于篇幅限制，只收集专题性的学术探讨及争论各方的重点文章，一般性的政论文章、表态文章或具体政策和工作实施性质的文章均未编入。

三、文章按专题分编，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为了研究方便，并把论战时期过后发表的重要文章也选录若干篇，附于各编之后，供对照参考。每编之前均有介绍本编情况的总说明。

四、所选文章均按原样排印，但改为横排，使用简化字和现用书名号。如发现原文有明显错漏，编著改动之处用〔〕号标明，

编者前言

难以辨认的字用□号标明；删节处用……号标名。每篇文章之前标明首次发表时间，文后注明所选的出处。

五、文章作者简介是编者所加，列于所选作者第一篇文章第一页下方。因缺乏完整资料，主要是为读者查找作者生平提供线索，不是作者的小传。少数作者生平不详，暂付阙如。

六、本书选编时间仓促，遗漏、选材和编排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指正并帮助提供新材料线索，以便有机会再版时改正。

1988年6月25日

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 演变的反思（代序）

罗 荣 渠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这一过程开始于西欧，扩展于北美和欧洲其余地区，然后蔓延向亚非拉美。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原生形态，那是一个内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过程，一般采取渐进的演变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晚近亚非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则大都属于诱发型，那是在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时间短而集中，往往采取突变的即革命的方式。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属于后一类型。

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看，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多年来，学术界探讨近百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与发展的论著有增无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一是研究大多偏重于晚清到五四运动时期，对“五四”以

后的研究迄今仍很薄弱，资料也缺乏整理。二是理论的僵化，对近现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党史化，甚至思想史的研究也被政治化，用划阶级成分和做政治鉴定来代替对思想进程的客观的科学探讨，选择的视角千篇一律，一直到近年才稍有改变。历史总是会不断被后人重新进行再认识的。为了探索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发展过程，最近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即重新翻阅了“五四”以来我国思想界各种论战的一些文献，选出其中四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编辑成书。这四次大论战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1915—1927年），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1933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新论战（30年代至40年代），关于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20年代至40年代）。从“五四”即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我国思想界进行过的论战形形色色，名目繁多，之所以挑选出以上几次论战作为审视点来进行研究，是因为除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过去被人们谈论得较多外，其他几次论战却很少人研究甚至不为人知，而这些论战对于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又具有直接关系，有助于考察现代化思潮发展的脉络。以上述几次大论战为线索，把它们联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从一个侧面探索中国近百年来主要是“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有可能获得温故知新的启示。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近年来研究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大都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外部刺激与

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本身做出反响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而这一回应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因此，对现代化认识的最早的理论概括一般都是西方化，虽然实际的现代化过程绝非按西方国家的模样亦步亦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这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取得的一点基本共识。对于其他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学外国，学西方，这一认识也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的回应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这场大论战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开始以来，一直延续不断，而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一个高潮。

从自强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在当时条件下，大概也只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但后来的研究者对中体西用论颇多责难，仿佛洋务的失败，变法的失败，都是这一折衷理论的错误。这多半是从失败之果追究失败之因所想出来的。其实这一口号对当时的现代化运动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的，而且获得成功，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日本的成功并不是它丢弃自己的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这是一种“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的现代化。中国与日本同时开始现代化，而在对日战争中被打败，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倡导，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革新之士悲愤异常，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单靠西学来补一下是不行了，必须做根本的改造。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

之。”梁氏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现代世界意识、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自由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①。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虽仍借用《大学》新民之义，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相比较，有许多观点是相吻合的^②。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由于它启迪了一代青年思想，应视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前驱。胡适后来回忆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的民族，很高的文化”^③。毛泽东等人最早建立的革命组织就取名叫“新民学会”，可见当时新民思想之深入青年。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论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在思想界仍一直占居上风。只是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吴虞等人充当了“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以绝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写道：“欧洲输入之文化与

① 参见梁氏所著：《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天国新法论》、《新民说》等篇，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

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因此，“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①而陈独秀所说的“欧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拥护科学与民主。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②

陈独秀所说的“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它的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一点在胡适的文章中也有明确的解释：

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漠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这也不是奇事：本来赛跑最怕赶上；赶上一步之后，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赛跑争先，虽然只有一个人得第一，落后的

①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答佩剑青年》，《新青年》3卷1号。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人，虽不能抢第一，而慢慢走去终也有到目的地的时候。
现在全世界大同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
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
是无可疑的。^①

在这里，胡适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代化观点。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和精神的，指出“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而“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②。这篇文章是西化论者在这场大论战中的代表作。从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重新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已朦胧地想象出现代人的特征，那么到“五四”前后，陈独秀则把“新青年”应具备的“现代人”特征完全和盘托出，那就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

①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②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的。^①就是今天来看，这六点也是对现代人意识的相当精到的概括。在十余年之中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如果把这一时期以反对孔教化为中心的西化思潮称之为“全盘西化”，我认为是很不确切的。正如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所言，陈独秀，胡适所说的“西化”都“不外是部分的西化”而已^②。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孙中山），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黄金思想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必须指出，“五四”以后，东西文化论战中有关西方文化的估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转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国际国内思想大变动的背景下发生的。“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所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③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被沾满了血污，于是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

①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②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3页。

③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

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太戈尔、金子马治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在这些新思潮的激荡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则从西欧文明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前者引起东西文化论战的新波澜，后者引起新文化运动的大分化。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这部新著作中，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①

^① 《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第二十三，第37—38页，第35页。

梁启超的最新观点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①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论，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反现代化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继梁启超之后，梁漱溟在1921年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该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新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化复兴”^②。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文化问题的一部系统性的新著，

① 《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第二十三，第35页。

②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99、200页。

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

后来，梁漱溟曾自认“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①。显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矛头是反儒学的，而正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了儒学现代化的第一部论著。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反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的第一年中就印刷五次之多，可见其影响之大。围绕该书提出的新观点在思想界展开的激烈争论，成为“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在围绕这本书展开的热烈讨论中，有一部被人们遗忘的著作，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介绍，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杨当时在思想界名气不大，但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他写的这部《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是通论性质，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论战后期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的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著作。^②

《评中西文化观》的一大特色是，通篇没有引用过马克思的

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

② 《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书局，1924年版。

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的概括。例如，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文化变革的原理：

凡是在或种天然地理及经济条件之下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愈久，愈不易变动。久处这种文化的民族其抵抗归化外来的文化之力也愈大。假使他所处的天然地理或经济的条件变动，则其文化随之也变动。所谓变动者即旧文化不适用，新文化产生或新旧并行皆是。其变动之时机如水旱天灾气候转移，人口增加，政治之战争，民族之互相迁合及其战争与侵略。但是文化虽变动而其民族习惯——性——常常的经过许久时期还存在其中。^①

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它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以及国民的社会生活，提出了融会贯通的新解释。作者在分析了中国历史长期停滞性的根由时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② 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就是机械代替手工，这样就能产生农业时代不能产生创造与转运的力量，于是引起全国生产制造品的变化，由无到有，由

① 《评中西文化观》第231—232页。

② 同上，第309页。

少到多，由必需品到奢侈品，人民的生活也随着生产由俭而奢。“生产力既发生了这样大变动，附属于生产力的要求也就继之而生”。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

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新世界”出现之时，便是旧世界崩坏之时。这种自然现象，真好似种腐于地而芽生。这原是宇宙间的东西由简而繁继续不断的进行。^①

杨明斋在这里所表述的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就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这是这场大论战留下的出色的文献之一，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东西文化观后期的论战无疑使讨论引向深入。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是当时西方思想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在中国引起的回应，但同时也为那些顽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遗老遗少们提供了精致的理论炮弹。他的三大系文化“无所谓谁家的好坏”的论点大概是他的佛学世界观的反映。他的玄学式的文化观与他最后提出要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造”是自相矛盾的。现在有人把这种对东西文化的玄学式的批评精神称之为“理智的批评精神”，而且把梁漱溟称为中国最早提出中国文化经过批评改造

^① 《评中西文化观》第310—311页。